

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为和平解放西藏赴亚东的缘起、成行及线路研究

宋月红 王晓慧*

摘要：为贯彻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毛泽东选派张经武赶赴西藏，劝说欲由西藏亚东出走的十四世达赖接受《十七条协议》。1951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张经武以中央赴藏代表的身份，历经陆路、海路，辗转中国多个地区以及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后，抵达亚东。这一行程路途遥远、曲折，且所负责任重大，最终促成十四世达赖由西藏亚东返回拉萨，并拥护《十七条协议》。之后不久，张经武由赴藏代表转为中央驻藏代表，直至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奔赴亚东，是西藏和平解放的重要环节，因此研究张经武赴西藏亚东的缘起、成行和线路等问题，有利于深刻认识和彰显张经武驻藏的历史价值与政治意义。

关键词：张经武 西藏和平解放 亚东

为贯彻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劝说在协议签订前移居西藏亚东的十四世达赖返回拉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派遣参加协议谈判和签订的中央代表之一张经武，赶赴西藏

* 作者简介：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西藏研究。王晓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

亚东开展工作。1951年6月13日，张经武一行历经陆路、海路，辗转我国多个地区以及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于7月13日抵达亚东。到达亚东后，张经武依据《十七条协议》劝说达赖，促使其返回拉萨，并推动其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张经武赴亚东并抵拉萨迎接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他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身份在西藏工作的序幕。其中，关于张经武赴亚东的缘起、动因及成功到达亚东的条件、线路，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的作用与意义等，目前学术界研究不足，^①一些史实也有待进一步廓清。本文依据有关文献档案、当事人回忆文章或日记等，对张经武赴西藏亚东的前因后果及其线路进行考述，以期更深入地反映和揭示张经武驻藏的重要历史作用与政治意义。

一 张经武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赴西藏亚东的缘起和条件

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地方上层“藏独”势力的挑拨下，1950年12月19日，十四世达赖一行200多人离开拉萨，于1951年1月2日到达亚东，欲随时准备出走印度。正因如此，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张经武为代表赴西藏亚东，劝阻达赖出境，并劝说其返回拉萨。亚东距日喀则309公里，距拉萨480公里，是从拉萨到西藏南部边境最远的地区。那么，达赖为何选择到亚东而没有去其他地方，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从拉萨去后藏边境的路线中，前往亚东的交通、住宿以及物资运输比较安全、便利。

达赖离开拉萨后，先到曲水宗，后过雅鲁藏布江，经江孜抵达亚东^②，共用14天。在当时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已然是比较快速的行程。历史上中央政府官员从拉萨到亚东，基本上选择这条线路。也就是说，这是多

① 关于张经武赴亚东劝说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研究不太多见，且多为概括性叙述，散见于综合性著述及有关张经武个人的研究和一些回忆文章之中。例如，宋月红编著《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张羽新主编《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纪录》（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朱晓明、张云、周源、王小彬主编《西藏通史·当代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等等。

② 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第37页。

数人都会走的道路。例如，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官员刘曼卿，1930年离藏时走的就是这条线路，她从拉萨到亚东用了12天。^① 国民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1934年入藏时也用了15天。^②

从拉萨南下离藏，必须过雅鲁藏布江，达赖过江时经过的是达嘎渡口。达嘎渡口是雅鲁藏布江所有渡口最大也最有名的，但凡从藏北和拉萨往南行，不论是到山南还是到日喀则，甚至到印度、不丹、尼泊尔，都要经过达嘎渡口。旺季的时候，这里一天要过几百人、上千头牲畜。^③ 达赖一行携带大批金银珠宝，共征用驮畜1000多头，每头驮55公斤左右，其中40驮是金子，600驮是银子，其余驮畜运的是有数百年历史的银质藏币。^④ 要携带这么多财物过江，必然要选择设施齐全、安全系数高的渡口，所以从达嘎渡口过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拉萨南下离藏，须经过江孜。据刘曼卿记载，江孜有英人建的邮局、医院、洋房，英军在此驻扎；过江孜后，沿途又遍设驿站，绝大多数为英国官员入藏的食宿基地。^⑤ 黄慕松也记载，江孜到印度的邮电由英人办理，由江孜到甘托克共有驿站11所，每站设电报、电话，与印度互通。^⑥ 过了江孜后，交通信息基本上由英人掌控。虽然刘曼卿和黄慕松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离藏的，达赖一行是在1950年赴亚东，相差近20年，但这20年间，英人在这一线路上的渗透、布防，尤其是信息联络越来越频繁，设施越来越完善，对想寻求英美帮助的达赖来说，出走到亚东有安全保障。

此外，噶厦还派朗孜厦米本和雪勒空雪聂对拉萨城内和郊区进行了周密部署，以保障安全，并在沿途驻扎治安部队，增派拉萨至岗巴拉山的警戒部队。^⑦

① 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原名〈康藏轺征〉》，民族出版社，1998，第116~120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第48~51页。

③ 丁小文：《情向西藏——刘曼卿的康藏轺征》，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第184页。

④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70~71页；杨新河：《达赖流亡集团的经济来源》，沈登远编著《经济大世界——〈经济世界〉精粹》，红旗出版社，1993，第141~143页。

⑤ 丁小文：《情向西藏——刘曼卿的康藏轺征》，第185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49页。

⑦ 恰宗·其美杰布：《忆1950年达赖喇嘛去亚东及劝和团迟玉锐来藏片段》，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民族出版社，2004，第2页。

在途中，噶厦、译仓将日喀则驻军第六代本 300 人调往江孜，部署在江孜到亚东一线。在出走前两天，即 12 月 17 日，令孜本南木林·班觉晋美带人去日喀则，观察后藏、藏北一带动静；18 日，令土丹旦达带领第三代本数名士兵作为达赖的仆从和先遣队，提前一天出发，侦查探路，每天向达赖呈送情况报告。^①

由此可见，达赖出走到亚东，虽然不是前往后藏边境最近的线路，但便利、安全是很有一定保障的。

其二，亚东地处中印边境，距离印度较近，英印势力渗透程度深，可借此方便地从印度逃亡至其他国家。

达赖“亲政”后，噶伦等部分亲英分子认为他不宜久居拉萨，主张“请其出国，投靠美、英帝国主义”^②。身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也声称，“印度政府答应派兵在中印边界接应”^③。距离西藏最近的出海口是印度的加尔各答，而从西藏前往加尔各答，亚东是必经之地。如果按计划出走至中印边界以便随时经印度再出走其他国家，必然需要先抵达亚东。

自元朝起，鉴于亚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和交通价值，历朝中央政府便开始对亚东边境防务进行管理。英人侵藏后，中国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亚东的控制。尤其是在 1908 年《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签订后，英军虽撤出春丕，但仍保留商务代表处卫队；并强行租借下司马作为租界，英人在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在亚东到江孜沿途的春丕塘、下司马等 12 个地点设立驿站，在亚东、江孜设置兵站，均由英国人管理。尽管在 1951 年之前，藏军在帕里、下亚东仍有驻军以维持边界安全，但两地驻军人数不超过 50 人。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英印对亚东的渗透极深，英人把控了亚东边界的管理，西藏地方对驻守在亚东的英印武装无力进行约束。

从亚东前往加尔各答，亚东与锡金交界的乃堆拉山口是必经之地。在亚东下司马、仁青岗等地有 11 条通往锡金的骡马驿道^④，这些驿道是西藏与

① 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第 37 页。

② 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第 36 页。

③ 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第 36 页。

④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亚东县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第 559 页。

锡金联系的主要通道。中锡边境的山口就坐落在这些古道上，例如乃堆拉、卓拉、则里拉、多卡拉等山口。其中，乃堆拉山口（海拔4318米）是最为重要的入藏、离藏的山口。它距离甘托克54公里，距亚东52公里，距拉萨400多公里，距加尔各答550多公里，是“中锡边界32个山口中海拔相对较低、通行条件最好的山口”^①。该山口恰好处于西藏与南亚的中间节点位置，是中锡间距离最短、便捷的陆路贸易通道。正因如此，乃堆拉山口成为近代以来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但是，乃堆拉山口气候无常，“通常1月至5月下大雪伴随大风，风雪弥漫眼难睁，天寒地冻路难行；6月至9月降雨，夏季雨水绵，衣被水珠涟；10月至12月刮大风，飓风、进口风，风吹沙石漫天跑”^②。1951年之前，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大多在6~12月经亚东离藏。达赖一行在1月抵达亚东，在这个时节带着大量财宝翻越乃堆拉山口更是困难重重。

综上所述，达赖离开拉萨后，先在亚东暂住，伺机行事，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就企图在英印的帮助下，在最短时间内逃往国外。

其三，亚东作为西藏最大的通商口岸，通信发达且人员流动性大，具有便于隐蔽及收集信息等优势。

达赖一行暂居亚东后，何时离藏、如何安全离藏甚至是否离藏成为关键问题。亚东为达赖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历史上，亚东一直存在传统的自由边贸，是西藏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人员流动性很大。到19世纪末，随着边民互市贸易不断发展，西藏地方完善边境管理制度，在亚东、帕里设税卡，对过往边境人员进行检查登记，并对边境过牧和贸易征税等。1905年，西藏地方政府设立“卓木基巧”，加强对亚东的行政和商务管理。^③在西藏和平解放前，抵达亚东边境的货物主要依靠人背马驮。亚东边贸最繁忙时，每天过往人数达700余人、骡马1000余匹。据统计，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亚东靠土地及骡帮驮运维持生活的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0%，靠背

① 张婷婷：《从乃堆拉山口的开放看西藏与南亚边境贸易的发展》，《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4期。

② 杨星火：《1975年，工作笔记1——采访一五七团四连（乃堆拉）指导员张振才》，百度，<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077611796303304&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6月9日。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雪域老兵吧，题为《1975年，杨星火采访乃堆拉指导员张振才，这里有群可爱的兵！》

③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亚东县志》，第893页。

运等维持生活的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20%。^① 如此一来，达赖一行因携带大量财物，若想安全离藏且不引起注意，便可隐蔽在人背马驮的商旅队伍之中。

同时，亚东的邮电通信业发达。达赖能够借助邮电通信搜集信息，以此判断何时离藏或是否离藏。西藏通邮前，官方公文由清政府驿站传递，亚东关的邮件则经海路绕道中国香港，由印度邮局转递；通邮后，英人拒绝撤走其在西藏强行设立的邮电局，西藏地方形成两国邮局同时并存的局面。1912 年民国政府西藏邮政成立，规定“由江孜至拉萨、江达一带邮政，归藏当局管理，邮票仅适用于藏境，过江孜以南即贴用英国邮票。至电报、电话，可谓英人为便利其商业及易通藏情而设”^②。但不久，西藏邮局、昌都邮局被关闭，仅在拉萨设立电台，作为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等机构联络之用。英国清除驻防边境的清军，控制从藏南进入印度的道路。1947 年印度独立后，英国在亚东的特权被印度接管。

因此，在商旅队伍的掩护下，借助英人控制的邮电、驿站，以及亚东地方的通信设备等，达赖等可与境内外进行沟通交流，收集信息，进而实现出走目的。1910 年十三世达赖离开拉萨时，便是前往亚东的英国商务代表处躲避，并在英人的掩护下出走到印度噶伦堡的。

其四，亚东有东嘎寺，东嘎寺为格鲁派寺庙，规模大、住宿条件较好，是首选居所。

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亚东有大小寺庙 30 座，分属藏传佛教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等。其中，距离乃堆拉山口最近的有两座：一座是格鲁派的东嘎寺；另一座是噶举派的噶举寺。

对于达赖来说，居住在东嘎寺是首选。东嘎寺，全称东嘎·扎什伦布寺，是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分寺，位于今上亚东乡如丙岗村东嘎山，以东嘎山命名，是亚东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寺庙。它创建于 1686 年，由一位名叫竹巴格隆君乃仁宝钦的僧人修建。初期仅有一间小经堂和几名僧人，教派为噶举派。后来四世班禅委派人对其进行扩建，改教派为格鲁派。19 世纪初，寺庙由于地震遭到破坏，扎什伦布寺派人修复并增建 10 间僧舍。20 世纪初，

①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亚东县志》，第 560 页。

② 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编《西藏古近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第 214 页。

在阿旺格桑·白桑布喇嘛主持下对其进行大规模扩建，修成南北长 62 米、东西宽 48 米，占地面积达 3000 平方米的一座大寺院。1937 年白桑布喇嘛逝世后，又增建一座灵塔殿。东嘎寺规定常年僧众为 150 人，实际最多时才 107 人。其活佛传承二世，即德瓦尔西巴和格西仁布且。

东嘎寺规模大，经济实力强，可为达赖一行 200 多人提供住所。东嘎寺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噶厦政府每年发给 150 名喇嘛的口粮，每人每年粮 6 克（每克约 14 公斤），由江孜付给；4 队（每队人数不定）寺属牧民，每年按规定向寺庙交纳一定数量的酥油和奶渣；在亚东县和康马县的 3 处庄园的收入；信徒们的施舍。^① 1910 年十三世达赖出走印度时，就在东嘎寺休息过；1912 年他回藏时，也经过了亚东。

相比较而言，虽然噶举寺距离乃堆拉山口最近，它建在乃堆拉山口北侧的半山上，居高临下，位置十分险要，但是由于建造在乃堆拉群山之中，地势使其无法增扩，规模和居住条件都有限，再加上仁青岗野兽多，无法保障几百号人的安全居住。噶举寺于 1747 年建造，东西长 50 米、南北宽 20 米，共传承 11 代，喇嘛人数最多时有 50 多人^②，隶属于噶举教派，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生产和群众的施舍。^③

因此，综上所述，达赖选择东嘎寺作为居所有其便利的条件。

二 关于张经武赴西藏亚东前，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主要交通路线

中国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西南边陲，受复杂自然环境制约，加上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辖、茶马古道的商贸活动、西藏地方与境外商贸往来等因素的影响，西藏地方逐渐形成了两条通常出入西藏的交通线路：一条是经过与西藏北部、东部、东南部相邻的省份出入西藏，比如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进入西藏，此条交通路线一般称作陆路通道；另一条是经过与中国

① 索朗旺堆主编，何强等编写《亚东、康马、岗巴、定结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 23~26 页；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亚东县志》，第 714~717、896~998 页。

② 乐于泓在日记中说，他们在 1951 年 7 月 14 日途经噶举寺时，寺里共有喇嘛 70 人。

③ 索朗旺堆主编，何强等编写《亚东、康马、岗巴、定结县文物志》，第 28~31 页。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亚东县志》，第 714~717、896~998 页。

西藏西南部或南部相邻的国家出入藏，如过境尼泊尔、印度、不丹、缅甸出入西藏，此条交通线路通常称为境外通道。其实除了上述两条交通线路外，还有一条，即从中国大陆经海路过印度等出入西藏，此条交通路线又被称为海路通道。

陆路通道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各地开展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通道。自元朝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后，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陆续修建并完善了从首都入藏的驿站交通，由此逐渐发展出4条入藏驿路。至清代，从新疆至西藏，入藏驿路须经藏北羌塘无人区，因环境极其险恶而被排除外，主要有入藏驿道3条：第一条是从北京皇华驿出居庸关，经陕西、甘肃到四川，再由川康道入藏；第二条是由北京经直隶（河北）、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入藏；第三条是自北京、河南等地，绕道云南中甸，从中甸到西藏洛隆宗，再从洛隆宗经康藏驿道至拉萨。^① 中央政府在这些路线上设置了众多台站，并设军台、营塘等派兵把守，巩固了边疆安全，稳定了西藏地方。因为陆路通道设施完备方便运输物资和进行信息沟通，且走陆路通道能够察看沿途各地情势，所以在20世纪之前，中央政府派兵或派遣官员赴藏时基本选择陆路通道。例如，清朝驻藏时间最长的官员联豫在1906年入藏时，与他的前任凤全一样，都由川康道入藏。^② 20世纪以后，海路通道开通，从海道经印度入藏，比陆路入藏要更为便捷、更节省时间，于是入藏路线有了其他选择。清朝最后两位驻藏大臣张荫棠^③、温宗尧^④及亚东关官员张玉堂^⑤入藏，走的就是海路通道。

民国时期入藏陆路通道与清代大体相同。黄慕松与吴忠信对此进行了详细记叙。1934年，黄慕松被派入藏追封、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记叙了西藏通往祖国各地的6条道路，其中包括：从新疆入藏的2条道路；从四川入藏的北道和南道2条道路；从云南入藏的1条道路；从青海入藏的1条道路。^⑥ 黄

① 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编《西藏近代交通史》，第163~166页。

② 《驻藏帮办联豫奏报出关赴藏沿途查看情形折》（十月初八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七），卷19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3605页。

③ 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第265页。

④ 《赵尔丰致军机处请飭温宗尧由海道赴藏电》（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十日到），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编《近代康藏重大事件资料选编·第一编》（上），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第421~422页。

⑤ 周伟洲、周源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下），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第554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88~89页。

慕松赴藏时是从四川康定启程,经甘孜、德格,渡金沙江入昌都到拉萨,走的是经四川入藏的北道,历时3个半多月,经过74个驿站。由康定、巴安、理化到昌都入拉萨,这一路线是“驻藏大臣出入康藏之通衢”^①,也就是四川入藏的南道,“逊清钦差大臣入藏多取此道”^②。前文所述联豫、凤全走的即这条道路。1939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奉命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记载了西藏通往祖国内地(除新疆)的4条道路。其记述与黄慕松的记载相差无几,只是对所经驿站的记载更为详细。据他介绍,这4条入藏道路均需花费两个半月才能抵达拉萨。^③

黄慕松和吴忠信详细记录了境外通道。黄慕松记载了从西藏通往境外的4条路线,即通往印度的2条,通往尼泊尔、不丹的各1条。通印的两条路线分别为:一条由拉萨经江孜、帕里到亚东,越龙头山(即隆吐山),到噶伦堡(即噶伦堡),这是英印商人、官员出入西藏的主要通道;另一条由拉萨经江孜、帕里,越纳都岭(即乃堆拉)、昌谷^④,到哲孟雄(今印度锡金邦)都城江都(今甘托克),为传统交通要道。相比之下,后一条通印线路更为便捷一些。从亚东出发,前一路线需5日到噶伦堡,后一路线仅需2日到甘托克。^⑤ 吴忠信认为,由隆吐山到亚东和由甘托克到亚东,“前者路较难行,且须多费两日”^⑥。吴忠信记载了由海道赴藏的2条道路:一条是取道滇缅公路,经仰光、加尔各答,过锡金入藏;另一条是取道滇越铁路,经海防,过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由锡金入藏。^⑦ 可见,无论是境外路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1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88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89~196页。

④ 昌谷是从甘托克到乃堆拉山口的必经之地,距离甘托克20英里,这里常年下雪[参见〔意〕图齐(G. Tucci)《到拉萨及其更远方——1948年西藏探险日记》,李春昭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第16~17页] 昌谷距亚东19英里(“从锡金至拉萨之里程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96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50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40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89页。

线还是海路通道，加尔各答、锡金都是必经之地。与黄慕松入藏时走陆路通道不同，吴忠信是由海路入藏的。1939年10月22日，吴忠信由重庆起程，先到香港，经缅甸仰光、印度加尔各答、西里古里、噶伦堡、锡金首邑冈多（即江都，今甘托克），12月23日到亚东；1940年1月15日到达拉萨。^①共耗时不到3个月，比黄慕松花费的时间要少半个月。

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派员入藏选择陆路还是海路，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与中央政府是否计划考察西藏沿途情势、解决西藏边防问题、处理西藏涉外事务有关，尤其与英印干涉西藏、限制中央政府派员从陆路入藏等关系很大。为考察康藏现状，“汇集成册，以供政府之参考”^②，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派刘曼卿入藏。她从成都出发，1930年3月1日到拉萨，5月从亚东离藏，她是从陆路入藏的。然而，在英国人的挑唆下，西藏地方政府不希望中央派人从川、青两省入藏，而是要求“从印度入藏”^③，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派员入藏时不得不选择海路。例如，国民政府西藏慰问专员贡觉仲尼，携带蒋介石致达赖喇嘛、噶伦擦绒信函，以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函和礼物等，便是取道海路入藏的，于1930年2月16日抵达拉萨。自1939年吴忠信由海路入藏后，中央政府派员入藏时，多取海路通道。出藏路线与入藏路线相比，也有一个变化过程。20世纪前，中央政府官员离藏多取陆路通道；20世纪后，由境外通道离藏成为较多选择。例如，1934年11月28日黄慕松离开拉萨返回内地^④，于1940年4月14日吴忠信离藏回京^⑤，都取海路。中央政府官员多由海路离藏，其中原因除了海路更为便捷、条件更好之外，还与英印政府蓄意干扰我国西藏事务有关。我国政府需派员去印度与英印方面谈判沟通、交涉后，再从印度返回。

历史上，中央政府派员入藏时，走境外通道的时间比走陆路通道要晚。

-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39~142页；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亚东县志》，第786页。
 - ② 《刘曼卿申请入藏调查边情呈文》（1929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一/2627）；转引自周伟洲、周源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第181页。
 - ③ 丁小文：《情向西藏——刘曼卿的康藏招征》，第61页。
 -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48~61页。
 -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55~156页。

最直接的原因是，境外通道的形成及路线成熟度在时间上都晚于陆路通道，尤其是走海路经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的路线。^① 在 1951 年张经武入藏前，历届中央政府官员走海路入藏，一般都要经转印度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是内陆国家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出海口，距海约 40 公里，原为一个江边小村，17 世纪末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下逐渐发展成为印度东部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是印度的铁路枢纽和国际航空站。在抗战时期，加尔各答曾是中国重要的航空邮路和信件中转地。^② 由于加尔各答的存在，中央政府派员入藏就有了不同于陆路入藏的选择，即走海路先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转道尼泊尔或锡金入藏。然而，无论是经尼泊尔还是经锡金入藏，都需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历史上，民众利用众多地形、地势特点形成的自然通道，构成高原地区和丘陵山地地区主要的交通体系，这些自然通道是边境地区交流交往的首选通道。青藏高原地势险峻，但有一些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大裂谷，例如东西走向的吉隆裂谷、聂拉木裂谷和南北走向的亚东-帕里裂谷，这些裂谷成为跨越西藏边境、出入西藏的天然通道。清中叶以前，西藏民众对外交流的对象主要为廓尔喀（今尼泊尔）人，从廓尔喀都城阳布（今加德满都）分别穿越吉隆裂谷、聂拉木裂谷可达日喀则。于是，从廓尔喀通过吉隆裂谷、聂拉木裂谷进入后藏，是清中叶之前进入中国西藏的首选和主要的境外通道，而与尼泊尔接壤的吉隆、聂拉木两地成为西藏通往喜马拉雅山外的交通孔道。^③ 18 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帝国主义利用亚东-帕里裂谷开辟出另一条翻越喜马拉雅直通拉萨的通道，即亚东-帕里通道，从锡金翻越喜马拉雅的山口便可进入中国西藏亚东。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中国西藏，亚东^④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且由英印派官员、军队驻扎。于是，亚东代替吉隆、聂拉木成为出入中国西藏的便利孔道，从亚东到达日喀则和拉萨，距离上都比从吉隆、聂拉木到日喀则和拉萨要近。正是在英帝国主义的蚕食下，入藏道路发生变化，海路通道逐渐形成。

① 查阅资料，未见从印度加尔各答至不丹，再从不丹再入藏的路线。

② 沈敦武：《冲破封锁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现代出版社，2016，第 90~95 页。

③ 赵萍、续文辉编著《简明西藏地方史》，民族出版社，2000，第 155 页。

④ 此为仁进冈外的老亚东，并非现在的亚东县所在地下司马；英军强行将亚东开辟为商埠后，对亚东所在位置不满，于 1905 年将春丕（下司马）辟为新商埠，且称该商埠为“亚东”，这是亚东北移的缘由。（详见刘武坤《西藏两处亚东地名之源起》，《历史档案》1997 年第 2 期）本文中的“亚东”，除非特指，一般指今亚东地区。

三 张经武一行选择境外通道赶赴西藏亚东

1951年6月13日，张经武一行离京启程前往西藏，计划经香港，取道印度、锡金抵达西藏亚东。与张经武同行的，除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以及翻译彭措扎西（达赖的姐夫）外，还有列席和谈的乐于泓、藏语藏文翻译彭哲（朋措扎西）、机要译电员兼机要秘书郝广福、医生徐乐天、副官李天柱、警卫员李永珂等20余人。

派张经武作为中央代表赴藏，与历史上的派驻藏大臣在性质、任务和使命上完全不同。1951年5月24日，也就是《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一封给达赖喇嘛的信，信的结尾说道：“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①这是中央委派张经武赴藏以及明确其赴藏身份的最早表述。^②随行人员乐于泓在其5月28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将要赴藏的事情：“关于回藏问题，决定阿沛走昌都一路，凯墨走印度一路，张经武同志为中央代表，同去争取达赖回拉萨。”^③随行人员郝广福在临行前一天才得知将要跟随张经武赴藏一事。^④从5月24日确定计划，到6月13日成行，时间十分紧迫。派往西藏的人选既已选出，接下来，便是赴藏。张经武此行选择由境外通道赶赴亚东。

其一，这是毛泽东关于推进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张经武临行前，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将达赖喇嘛委托阿沛·阿旺晋美给他的信交给张经武，说道：“看信的口吻，达赖不会很快就逃往国外，还在亚东。达赖年幼，他周围的一些反动分子是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的。”^⑤毛泽东强调，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从昌都入藏还需一些时间准备，到拉萨也

① 毛泽东：《给达赖喇嘛的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第45页。

② 宋月红编著《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第72页。

③ 乐于泓：《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53~54页。

④ 郝广福：《在张代表身边的日子里》，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内部发行，1986，第49页。

⑤ 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第6页。

得两三个月以后，“张经武需从香港、印度，直达亚东见达赖”^①，劝说达赖早日返藏。由此可见，毛泽东分析，从印度入藏花费时间短，可在第十八军从昌都进入拉萨前赶到亚东，敦促达赖喇嘛不出走国外、早日返回拉萨。这对于西藏地方贯彻《十七条协议》，实现和平解放极其重要。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藏和平进军。西藏条件艰苦，进军西藏“补给重于战斗”，部分进军部队同时承担先头勘察、修路、运输物资等任务。毛泽东在协议签订后的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训令，对进军拉萨进行军事部署：西南军区第十八军除留第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在甘孜、昌都地区修筑机场和公路外，第五十二师继续进军；西南军区第十四军之第一二六团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由新疆入藏的西北军区主力部队继续修通公路。^②“多路向心”向拉萨进军，物资补给的低效严重影响进军部队的速度。从昌都至拉萨2300多里，进军拉萨的道路比进军昌都更长，运输距离更远，牦牛运输的困难增加多倍；进军部队所需的物资量也更大，行动笨重。杨一真、魏克在日记中都记载了进军途中遇到的大量困难。^③另外，7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在致电第十八军、范明、西北军区的电报中指出，“今年入藏的补给工作实有很大的困难，并非过去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和容易”，“今年进入拉萨后，补给运输线延长到比去年多两倍以上”的牦牛运输路程，其困难必然超过去年入昌都的实际情况”。因此，西南局、西南军区建议，“首先减少第一批进藏的吃饭人数……现张经武已抵达亚东，达赖已准备回拉萨”。^④显然，从这些情况来看，若张经武跟随第十八军到拉萨，再从拉萨到亚东，这一行程耗时长、困难多，很可能不会及时到达亚东。如果他不在达赖出境前到达亚东，那么势必会影响或扰乱毛泽东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部署。

其二，张经武认为走境外路线更为适宜。在上述谈话中，张经武听到毛泽东建议他由印度入藏后，也觉得此方式较为稳妥。原因在于，“不仅时间快，对劝说达赖也有利，如果同入藏部队一起走，西藏形势不稳，大军压

① 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第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47页。

③ 参考杨一真整理《进军西藏日记（1950~1951）》下册，学苑出版社，2016；魏克《进军西藏日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

④ 杨一真：《十八军从甘孜向拉萨进军时阵中日记摘抄》，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出版社，2005，第207~208页。

境，搞不好，还有可能把达赖挤出国外”^①。在张经武看来，走国内路线，就需要与第十八军一起入藏，如此会引发西藏地方上层中一些人的猜忌以及藏族同胞的议论，还会增添达赖的疑虑。选择走境外线路，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军队护送，这会让达赖和一些西藏地方上层人士安心不少。关于这一点，在随行人员郝广福的文章中，也能得到反映：“去西藏走国内路线，高山重重，急流滔滔，道路难行。少说，四个月才能赶到亚东。而且要穿过前、后藏的拉萨、日喀则，在藏族群众对我不了解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引起种种议论；一些分裂主义分子，也会借机造谣生事。”^②

尽管入藏部队积累了向西藏进军和组织运输物资的经验，但如果张经武跟随第十八军进军拉萨，就会给西藏地方上层造成带着军队进军拉萨的嫌疑。毕竟跟随部队可方便携带大量武器和物资，还有大量武装士兵保护。进军拉萨会沿途经过多个藏地，也会给不熟悉情况的西藏民众带来困扰和疑惑，这便是上文中张经武所提到的“大军压境”之意。另外，陆路入藏还存在其他风险。进军拉萨的过程异常艰难，风险很大，因为西藏社会上层的分裂势力一刻也未停止对人民解放军的诋毁和破坏，采取多种手段阻止解放军进军拉萨。例如，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后来提及“难忘的是‘甘孜一月’”：“那时北路先头部队遇到了严重的粮荒，吃草根，野菜甚至打地老鼠充饥，同志们面黄肌瘦，部队体力普遍下降，能不能往前走，主要看肚子能不能吃饱了。当时反动派甚嚣尘上，他们利用我们粮食接济不上困难，有意刁难我们，所以粮食准备成为战役前各项准备工作的中心问题。”^③在先遣支队抵拉萨后，西藏反动势力唆使一些喇嘛和藏族青年“向解放军投石头、吐口水、光膀子进行挑衅”^④，利用西藏民众担心部队来得太多会致使物价粮价上涨的心理，“散布谣言”“制造谣言”。他们在先遣支队四周驻扎几个藏军代本，包围先遣支队。^⑤反动派的这些伎俩大大增加了进军拉萨途中的意外风险。这些意外风险必然会影响张经武能否完成他的特

① 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第6页。

② 郝广福：《在张代表身边的日子里》，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1页。

③ 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纪录》（上），第109页。

④ 夏景文：《回忆执行和平解放西藏任务的先遣支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纪录》（上），第429页。

⑤ 赵慎应：《向拉萨和平进军》，《西藏七百年》（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第1215页。

殊使命。

其三，从后来的历史结果来看，张经武选择走境外线路，除尽快赶到亚东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改善西藏局势外，还做了其他一些工作，有力地推进了西藏和平解放。在国内行程中，张经武向西藏代表介绍祖国建设情况，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十七条协议》，传递党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态度等，收到良好效果。张经武一行离京后，先后经过广州、深圳、香港以及新加坡、印度的加尔各答、噶伦堡、甘托克。在广州逗留期间，张经武陪同西藏地方政府的3位代表参观工厂和著名风景名胜，受邀为中共华南分局介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的经过。^①到了境外后，张经武在很多场合积极宣示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主张，表达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发展的关心，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7月4日，张经武一行到达噶伦堡，亚东噶厦派出噶伦堡商务代办处代表堪穷洛桑次旺和四品官索康·旺清次旦，以及当地华侨、汉族和藏族商人、中华学校师生等前来迎接。张经武参加了由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举行的欢庆会。参加欢庆会的还有西藏商务代办处的两位官员，邦达仓、桑都仓、热振拉章等藏族大商家，以及该校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张经武在会上讲话，多数人对签订《十七条协议》表示赞同。张经武到大吉岭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去看望阿沛在那里读书的5个子女，请他们吃饭并赠送纪念品。张经武还给中华学校捐赠3000卢比，参观东嘎寺的分寺塔巴曲林寺及藏人聚居区等。^②张经武在约见西藏在噶伦堡有影响的各界人士时，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民族政策，解释《十七条协议》精神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来西藏目的，特别是对“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一条做出反复解释和说明。他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诸位朋友如有机会，请将今天的约见和谈话，向达赖喇嘛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转告。”^③据说，噶伦堡经常有特务出没，“张经武利用一

① 张华川：《张经武的特殊使命（之二）·从北京到加尔各答》，网易，<https://www.163.com/dy/article/GNATFGJS0546RSTH.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6月9日。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雪域老兵吧”，题为《1951年，张经武的特殊使命，从北京到加尔各答……》。

② 张华川：《张经武的特殊使命（之三）·中央代表在噶伦堡的八天》，太行英雄网站，<http://taihangsummit.com/bdd0bb9e8a/>；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6月9日。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雪域老兵吧”，题为《1951年，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为何在噶伦堡待了八天？八天中他做了什么？》。

③ 郝广福：《在张代表身边的日子里》，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1~52页。

切有利条件，向亚东达赖喇嘛传递了信息”^①。这些努力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达赖和亚东噶厦对张经武一行的猜疑和戒备心理，对达赖返回拉萨有积极影响。到达亚东后，张经武一行利用机会对亚东地区进行经济贸易调查，包括印商、藏商和汉商的商铺经营情况，主要商品如羊毛、印茶的销售情况，亚东的物价和税收情况等。此外，他还和亚东总管邦达·养壁座谈，与印度商务代表索南姆顿丹交流，获得了大量信息和材料。这些信息和材料对中共中央了解西藏边境对外贸易情况，很有裨益。

四 张经武赴西藏亚东具体行程若干史实补正

《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一书中，对张经武赴亚东行程已有较为详细的叙述^②，是目前关于张经武赴亚东行程较为完整的著述。结合未公开出版的乐于泓日记^③，有几处历史细节需要加以补正。

1951年6月13日下午6时45分，张经武一行20余人从北京乘火车出发，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等人到车站欢送。15日晨到达汉口，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等人到车站欢迎，晚间参加欢迎宴会，之后过江南下，到武昌站乘火车。17日6时到达广州火车站，两广纵队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曾生，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方方迎接，入住沙面附近太平路（今人民南路17号）省府交际处第一招待所（1930年开业，集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的白宫酒店）。由于买票问题，在广州逗留到26日。18日至22日，张经武陪同西藏地方政府的3位代表分别参观黄花岗公园、观音山、

① 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第14页。

② 关于张经武赴亚东、在亚东工作及离开亚东的内容，参考宋月红编著《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第77~91页。

③ 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第46~68页）一文收录的乐于泓日记，为删减版，内容不完整。这里所说的“未公开出版的乐于泓日记”主要为张华川提供的乐于泓日记部分完整内容。张华川在网络上已发表部分内容。参考张华川《张经武的特殊使命（之二）·从北京到加尔各答》，网易，<https://www.163.com/dy/article/GNATFGJS0546RSTH.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6月9日。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雪域老兵吧”，题为《1951年，张经武的特殊使命，从北京到加尔各答……》；张华川《张经武的特殊使命（之三）·中央代表在噶伦堡的八天》，太行英雄网站，<http://taihangsummit.com/bdd0bb9e8a/>；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6月9日。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雪域老兵吧”，题为《1951年，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为何在噶伦堡待了八天？八天中他做了什么？》。还有部分内容未公开发表，由张华川提供。下文中涉及乐于泓日记，皆出自上述内容；不再赘述。向提供资料的张华川表示感谢！

造纸厂、饮料厂、洋灰厂等。其间，他先后见到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南分局办公厅副主任、广州市总工会主席、华南分局职工委员会第二书记、南方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前身）第一副校长等人。21日，得知香港飞新加坡机票比较好买，但新加坡飞印度加尔各答每周仅一次航班，新加坡签证有效期是24小时，最早飞新加坡航班在30日，且飞加尔各答的机票少，只有10张。所以为尽快到亚东，张经武决定队伍分批赴藏。22日，参观南方大学，陈唯实校长组织学生欢迎并召开欢迎会，张经武在会上讲话。25日，军委联络部刘雨平^①科长先抵港购票并安排住宿。27日7时15分，张经武一行离开广州，乘火车于12时15分到深圳，下午2时到达香港。火车到香港地界遇到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请求采访，予以拒绝。到港后，由新华社安排入住中国银行在港岛西侧摩星岭购置的福利别墅，外国记者跟踪到此请求采访，再次遭到拒绝。28日，美国合众社在香港发布新闻：“中共人员显然携带手枪保护着西藏代表，代表称未授权答复记者。”^②29日，张经武一行游览前山、后山潜水湾浴场，晚间中国银行领导设宴招待。

张经武助手、第十八军联络部部长乐于泓，在从香港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行程中，未与张经武同行。从香港到印度，队伍分成3批。张经武等10人先行一步。6月30日，张经武带领机要秘书兼译电员郝广福、内勤警卫人员李永珂、藏文翻译朋措扎西，噶厦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及汉文翻译尧西·彭措扎西，以及中国驻印度政务参赞申健和一名英文翻译，共10人，先飞新加坡。乐于泓和噶厦的英文翻译桑都·仁青、外交部信使王算3人飞新加坡，他们的机票定在下一周，乐于泓与张经武约定7月10日在印度噶伦堡会合。军委联络部刘雨平、军委办公厅警卫副官李天柱，军委联络部机要员和报务员杨树荣、张昌鼎、李作勋，中央军委办公厅电报整理科科长郝创兴，总后外科医生徐乐天、司药魏晓峰、护士冯冠森，以及搭伴同行的英文翻译，共10余人，带着70余箱礼

① 在郝广福文章中，刘雨平作“刘羽平”（参见郝广福《在张代表身边的日子里》，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1页）；在徐乐天文章中，作“刘雨屏”（参见徐乐天《拉萨影痕（1951—1953）》，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第13页）。应为同一人。

② 张华川：《张经武的特殊使命（之二）·从北京到加尔各答》，网易，<https://www.163.com/dy/article/GNATFGJS0546RSTH.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6月9日。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雪域老兵吧”，题为《1951年，张经武的特殊使命，从北京到加尔各答……》。

品，乘一艘排水量 4000 吨的英国商船，从香港经缅甸仰光、泰国曼谷、新加坡到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乘飞机到西里古里，再换乘汽车到噶伦堡，在噶伦堡停留数日后乘汽车到锡金甘托克，然后乘马翻越乃堆拉山口，过帕里、江孜，于 1951 年 9 月 8 日到达拉萨。^①

7 月 1 日下午 2 时，张经武一行 10 人搭乘飞机从新加坡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驻加尔各答领事馆总领事姚仲康以及华侨代表等前往迎接，并于当晚设宴欢迎。^② 7 月 2 日，张经武一行在申健的陪同下，游览了加尔各答的一处公园。7 月 4 日，张经武一行搭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抵达孟加拉北部的锡里格（即西里古里）^③。然后，从西里古里机场乘坐汽车前往噶伦堡。亚东噶厦派噶伦堡商务代办处代表堪穷洛桑次旺和四品官索康·旺清次旦迎接，当地的汉藏商人、中华学校师生等也在日喜路九英里处打着横幅列队迎接。在张经武等人到达噶伦堡之前，即 6 月 27 日，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已令帕里宗本雪康·索朗塔杰和尊珠·朗噶（当时亚东的大头人）抵达噶伦堡。在当地两个西藏巨商四品官邦达·养壁和桑都·久美（其弟是与乐于泓同行的桑都·仁青）的帮助下，张经武一行选定入住噶伦堡最好的喜马拉雅酒店，但考虑到该酒店常有特务进出且记者众多，出于安全考量，最终改住在印度人杰印乌特提供的一间别墅里。

关于张经武在加尔各答的时间，存在不同记载。在《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④中，刊登有张经武在加尔各答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官员的照片，日期标注为“1951 年 7 月 8 日至 9 日”，此处时间有误。根据《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 4 日和 8 日新闻以及乐于泓日记，张经武于 1951 年 7 月 1 日抵达加尔各答，并在加尔各答停留至 7 月 4 日，4 日当天飞往西里古里。时间出错的原因可能是《人民日报》刊发时间与内容记载时间并不一致，相差了几天。

7 月 7 日 8 时，乐于泓等 3 人飞往新加坡，下午 4 时 50 分到达。8 日早 8 时乘飞机，下午 3 时 30 分抵达加尔各答，领事馆的张健前往迎接。9 日在

① 徐乐天：《拉萨影痕（1951—1953）》，第 12~21 页。

② 《赴藏代表张经武等抵达印度》，《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 4 日，第 1 版。

③ 《张经武等由印度动身赴藏》，《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 8 日，第 1 版。

④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 52、53 页。

加尔各答休息一天，购买了一些照相器材和胶卷等，并给张经武发电报称计划11日赴亚东。10日，乐于泓3人乘飞机飞往西里古里，然后坐汽车到达噶伦堡，与张经武会合。

关于张经武一行人抵达噶伦堡的时间，也存在不同记载。雪康在其文章中，张经武、乐于泓等人于7月10日到达噶伦堡，“7月10日，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阿乐（乐于泓）部长、翻译平（朋）措扎西和一名机要员、一名保卫科干事及我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于下午一时左右来到噶伦堡”^①。郝广福在文章中说：“七月十日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到达噶伦堡。”^②《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记载，“1951年7月10日，张经武一行达到噶伦堡。”^③然而，根据乐于泓日记及《人民日报》，张经武在7月4日到达噶伦堡，乐于泓等3人在10日到达噶伦堡，这两个时间应更为可信。乐于泓在日记中记载了7月4日到9日张经武在噶伦堡参加的活动，包括参加当地华侨举办的欢迎宴会、中华学校举办的宴会，前往距离噶伦堡50公里外的印度大吉岭看望阿沛在那里读书的5个子女，以及参观景点等。这些活动繁多，一天之内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朋措扎西在文章中也说，“原想在这里等候从海运前来的礼品到后，运往亚东送给达赖喇嘛”，“我们在噶伦堡大约等了一个星期左右”。^④他跟随张经武于4日抵达噶伦堡，11日离开噶伦堡，在噶伦堡确实共待了7天，其叙述没有问题。因此，雪康和郝广福的说法、《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中的记载，都很可能有误。雪康是噶厦政府派往噶伦堡迎接张经武等人的，为何他会如此记载？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可能是雪康记错时间，如表述不清，将“4”写成“10”是有可能的；其二可能是张经武到噶伦堡后未第一时间与雪康联系，而是在10日与乐于泓会合后，才与雪康见面。从西里古里乘汽车到噶伦堡很便捷，一天之内即可到达。张经武4日到西里古里，除非在西里古里停留，否则不可能10日才到噶伦堡。结合乐于泓日记中记载的张经武在噶伦堡参加众多活动，很可能是第一个原因。至于郝广福、《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为何也认为

① 雪康·索朗塔杰：《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60页。

② 郝广福：《在张代表身边的日子里》，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1页。

③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第54页。

④ 朋措扎西（彭哲）：《我所经历的西藏和平解放》，张晓明编《见证百年西藏：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第112页。

他们在10日到达噶伦堡，有待日后有新的材料再作解释。^①张经武等10人和乐于泓等3人在离开噶伦堡前，前述携带礼品的第三批乘船的队伍还未到达噶伦堡，他们是后来在拉萨会合的。

11日下午3时45分，张经武等人在参观完塔巴曲林寺、游览过十里街后，在藏族代表的欢送下，乘汽车前往锡金首都甘托克。这一时间在乐于泓日记、雪康^②的文章以及噶伦堡著名藏商马铸材孙子马寿康的回忆文章中^③，均有记载。郝广福在其文章中说：“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我们骑马爬山向既定的目标亚东出发。”^④文中的“第二天”指7月11日，但此处可能有误，应为7月12日，因为从噶伦堡到甘托克乘汽车很方便到达。11日晚，张经武一行住在甘托克一处英人修建的驿站中，锡金王子的秘书和印度专员前来拜见。12日一早，他们换骑骡子向东北方向前行，晚上住在措果驿站。13日上午9时45分出发继续行进，下午2时15分到晚上6时45分，共行进4英里，成功翻越乃堆拉山口，进入我国西藏亚东地区，然后再行3.5英里于7时30分到达春丕塘，并在此地住下。也就是说，张经武进入亚东境内的准确时间应是7月13日。

14日11点40分，张经武一行继续下山，途经噶举寺。下山走了1.5英里，山下便是起曲墨村（今切玛村），噶厦然巴带领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和达赖的警卫团官兵前来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又走一段路后，到达春倍汤（今春培村），达赖派代表来献哈达及稞子。吃完茶点后，一行人一起经那别（亚东总管邦达·养壁总管府）再行3英里半到达亚东（今下司马镇）。晚上6时40分到达住地，随后有汉人代表、印商务代表前来请求接见。与

① 张华川认为，雪康的文章是他本人30多年以后的回忆，是口述的，是经过他人翻译、整理后收录的，时间上出现错误难免。后又被《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一书照单全收，等于以讹传讹了。张华川还认为，乐于泓日记原版是当时记录的，准确性更高。

② 雪康·索朗塔杰：《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62页。

③ 马铸材是噶伦堡中华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他组织了噶伦堡中华学校欢迎张经武的欢庆会。其孙子马寿康回忆内容见张华川的文章。其长子马家奎在欢庆会上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他后来的文章提到张经武在噶伦堡待了10天（马家奎：《回忆父亲马铸材》，龚宁珠主编《爱国老人马铸材》，云南华侨历史学会，1998，第59页）。虽然时间长短有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张经武不可能在噶伦堡只待了一天。

④ 郝广福：《在张代表身边的日子里》，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2页。

噶伦约好明天 11 点再来商谈。至此，张经武终于抵达此次赴藏的目的地亚东。^①

从 13 日翻越乃堆拉山口到 27 日离开亚东，张经武等人在亚东境内共待了 15 天。这 15 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劝说达赖返回拉萨、拥护《十七条协议》。15 日，噶伦然巴、索康、朵噶、洞波按照约定拜访张经武，双方谈到第二天和达赖见面时的仪式问题，最终商妥，采纳乐于泓的意见，见面仪式要充分体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正确关系。16 日上午 11 时，然巴噶伦来接张经武去东嘎寺与达赖会面。会谈中，达赖决定尽快启程回拉萨，但未对《十七条协议》表态。因送给达赖的礼物未到，张经武决定从亚东前往拉萨。21 日，张经武等到东嘎寺送达赖启程回拉萨，2 天后的下午 1 时，张经武一行也启程离开亚东赴拉萨，途中经过了锅^②（23 日）、帕里（24、25 日）、吐那^③（26 日）、加拉^④（27 日），离开亚东境内。一路上，他们一直住在英帝国主义侵略时修的兵站性质的旅店或驿站内。7 月 27 日，后半程进入日喀则，后又经江孜、浪卡子，渡过雅鲁藏布江到曲水，于 8 月 8 日早于达赖到达了拉萨。在拉萨，张经武完成了在亚东没完成的任务。9 月 28 日，他将毛泽东主席赠给达赖的礼物赠送给达赖。^⑤

10 月 24 日，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在致敬毛主席的电文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⑥电文由彭哲译成汉文送张经武审阅后，用电报发出。^⑦经过张经武的劝说和

① 《张经武抵西藏会晤达赖喇嘛》，《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15 日，第 1 版。

② 雪康称此地为噶乌；英国建立的从亚东到江孜的驿站中，此地为告乌（或告乌道班），即今亚东县嘎布村。参考雪康·索朗塔杰《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第 65 页。

③ 雪康称此地为堆纳，今亚东县堆纳乡。参考雪康·索朗塔杰《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第 65 页。

④ 雪康称此地为卡拉，今日喀则市康马县嘎啦乡，此时已离开亚东境内。参见雪康·索朗塔杰《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第 65 页。

⑤ 《张经武将军代表毛主席向达赖喇嘛赠礼》，《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31 日，第 1 版。

⑥ 《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27 日，第 1 版。

⑦ 朋措扎西（彭哲）：《我所经历的西藏和平解放》，张晓明编《见证百年西藏：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第 117 页。

督促，十四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对《十七条协议》表示拥护，为协议在西藏的贯彻执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张经武圆满完成了赴亚东的使命。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张经武作为代表赴西藏亚东，劝说在亚东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促其拥护《十七条协议》。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西藏地方交通落后且周边国际形势复杂，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张经武代表选择走境外路线赶赴亚东，为尽快到达亚东，张经武代表在入藏路上历经艰难。最终张经武成功赶赴亚东，完成劝说十四世达赖回到拉萨、促其拥护《十七条协议》和迎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使命。之后，张经武代表又由赴藏转为驻藏，直接领导和参与了西藏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赴藏、驻藏代表，是新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行使治理的重要象征。阿沛·阿旺晋美在纪念张经武 100 周年诞辰的文章中指出，张经武代表“是第一个进入西藏的高级领导人，也是第一个把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良好形象展现在西藏僧俗人民面前，同时把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十七条协议’的基本原则传达给了西藏的僧俗官员和人民群众，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定政治局势的重要作用。他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在了拉萨城头，向世人宣告，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①。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唯一一位赴藏、驻藏代表，历史性地践行了中央驻藏代表制，开拓了西藏和平解放的道路，为在西藏确立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历史经验、提供了历史借鉴，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上的一座历史丰碑。

^① 宋月红编著《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前言”，第 2 页。